

桂下漫笔

态度与方法：谁是陈寅恪看得上的教授

文·胡一峰



图为陈丹青油画《国学研究院》局部，五位学术大师左起分别为赵元任、梁启超、王国维、陈寅恪和吴宓

著名历史学家陈寅恪先生向称“教授中的教授”，学问渊博，是近代以来段位最高者。中国文人有才者多狂傲之气。陈寅恪眼界很高，治学格局和气度也大，对学界的人和事，往往有独到之处，不过表达得婉转含蓄。

近读某人物周刊，提到当年钱穆先生的《国史大纲·引论》在昆明《中央日报》发表后，引起轰动，并说陈寅恪也很欣赏这篇文章，你一定要读。张其成向文章题目。陈答，钱穆的《国史大纲·引论》。于是，张其成前往宜良访钱穆，并将陈寅恪之言告诉了钱穆。这段学术姻缘大体属实。不过，要说陈寅恪对《国史大纲》关注则有之，“欣赏”却未必。

这一点，从钱穆的回忆中就能体会出来。《国史大纲》印出后，钱穆曾致函陈寅恪，请其指正书中的错误。陈寅恪没有正面回应，只是说，惟恨书中所引未详出处，难以遍检。钱穆对此的解释是，这是一本教科书，力求简净，篇幅短，所引材料多略去出处。两位史学家这段看似平淡对话，却是一场高手之间的内力比拼，反映出陈寅恪对钱穆《国史大纲》的真实看法，简单地赞许其态度，反对其方法。相比于《国史大纲》，钱穆早年所著《先秦诸子系年》更受陈寅恪青睐。他对同为史学家的友人杨树达说，这本书极精湛，心得极多，至可佩服，王静安后未见此等著作。王静安就是王国维。如果说近代学界有一人真正被陈寅恪看得上，应该就是王国维了。

陈寅恪和王国维是清华国学院的同事，两人经常在一起谈古论今。据王国维的学生戴家祥回忆，陈寅恪和戴在清华散步聊天时，自称平生最佩服王静安，其次是陈垣。1927年6月2日，王国维自沉于昆明湖。陈寅恪写的挽联是“十七年家国魂销，尤余剩水残山，留与暴臣供一死；五千卷牙牙新学，待检契文奇字，谬承遗命倍伤神。”所谓“谬承遗命”，应指王国维遗嘱中说的，“书籍可托陈、吴二先生处理”。吴是吴宓，陈即陈寅恪。陈寅恪忠于亡友之托，把王国维遗著托王的助教赵万里整理。又和北京图书馆馆长袁同礼商量，由北京图书馆买进王国维藏书，以免丧失。最初议价1万元。但袁氏查阅藏书，发现有些为市面通行本，馆中已有复本，建议剔除部分藏书，并拦腰还价至5000元。陈寅恪又协商袁可先选，剩下部分由研究院同人及王先生亲友选购，留作纪念。不管得值多少，北京图书馆负责补足万元。

陈寅恪是长期站在学术红地毯上的明星，对他的研究汗牛充栋。也有人认为，陈寅恪与王国维互相欣赏，是遗老惜遗老，在怀念旧时代中找到了思想共鸣。我以为，这种看法并不准确，真正的原因还得从治学态度和方法上找。以态度论，治学路向无非有二，其一，视历史为完全外在的研究对象，将自身隔离于历史之外，以一个“旁观者”的身份考订真伪、辨析源流。其二，

将历史与研究者为互文，以“体悟者”的心境和胸怀关照历史，这样历史就不只是外在的时留痕，也不是学者理性研究的对象，而且是心性体悟的对象，此时的史学家面对历史，看到的其实是自身文化人格之外化，研究的过程其实是一场与往前贤的心灵对话，是和他们共同探讨事关人类整体的一些永恒问题。

钱穆的《国史大纲·引论》中曾批判有些人研究历史，“震于‘科学方法’之美名，往往割裂史实，为局部狭窄之追究。以活的人事，换为死的材料。治史譬如采矿，治电力，既无以前人整段之活动，亦于先民文化精神，漠然无所用其情。彼惟尚实证，夸夸其词，号客观，既无意于成体之全史，亦不论自己民族国家之文化成绩也。”钱穆批评的，大体就是上文所说第一种治学态度。陈垣先生是宗教史大家，有的研究看起来生僻，却包含深切的现实关怀，比如他在八年抗战期间所写的《南宋河北新军道教考》《明季滇黔佛教考》《清初僧侣记》，就以激励民族气节为旨趣。而陈寅恪更是如此，无论是研究看似细末的狐臭，还是晚年竭尽心力“颂红妆”，都是从历史的微小处，探究史事文化发展的大关节。而陈寅恪的文章之所以耐读，也在于他总是从浩瀚的史海中拈起一两朵浪花来，细致地展示给人看，而这些浪花中折射的却是无比宽阔的海洋，以及潮头之趋向。当我们惊讶

于陈寅恪捕捉浪花的精准能力时，其实应该想到，这正缘于他独特的文化怀抱。我以为，在治史的态度上，陈寅恪和王国维，包括同为陈寅恪赞赏的陈垣，以及钱穆采取的都是第二种治学路向。他们在这里找到了美人之美的心灵通道。

不过，陈寅恪虽认同此“态度”，却还坚守“方法”的底线，恪守治学须秉持科学规范的方法。他在《王静安先生遗书序》中将王氏治学方法概括为“二重证据法”，要点有三，“一曰取地下之实物与纸上之遗文，互相印证”，“二曰取异族之故书与吾国之旧籍，互相印证”，“三曰取外来之观念与固有之材料，互相印证”。这是他和王国维共同奉行的治学方法。而这一切，都是建立在以证据说话的基础上，要是像《国史大纲》那样用材料不出出处，就会丧失学术驳议或修正的基本条件。前文说过，陈垣先生是仅次于王国维获得陈寅恪青睐之人，陈寅恪曾说，陈垣“先生之精思博识，吾国学者，自钱穆后，未有之也”。但新中国成立后，陈垣提出“法高邮”不如“法韶山”，“高邮”借指乾嘉学派，“韶山”不言而喻。这于陈垣固出于真心，陈寅恪则不以为然。在他看来，“高邮”代表了治学的基本规范，这些虽属于治学之“术”，但“术”若严重缺失，也会影响到“道”的畅快表达。而在这个“道”，又正是他与王国维等看得上的文化人们一起悉心呵护的。

随想随录

“视窗”里的世界

文·朱书堂

我们对于视窗并不陌生。个人电脑的Windows操作系统，只提供微软公司定向销售的视窗界面；摄像器材的视窗，留给人们的是摄像者精心选择的画面；而我们观察世界的视窗——眼睛，却会从同一个客体看到不同的特征。这种现象，我们姑且称之为“视窗效应”。

人类的认知和思维领域，也同样存在“视窗”。这个视窗，是由其成长的环境、接受的教育以及生活的阅历共同形成的。

婴儿呱呱坠地，其大脑和心灵几乎一片空白。可以接受外界输入的所有信息，不存在主观的选择。最早的信息输入来自于家庭环境。家人的言语行为、知识结构、道德水平，成为新生儿认知世界的第一个“视窗”。《三字经》开篇即讲：“人之初，性本善；性相近，习相远。”这个习，就是新生儿的“视窗”。孟子的母亲屡次搬家，就是要改变少年孟轲的“视窗”。

新生儿不断成长，第一个视窗已经不能满足其需要，于是就要上学、读书，接受教育。书是什么？书只不过是作者或编者通过自己的思维“视窗”，留给读者的经过精心选择的信息而已。《庄子》“天道”篇论扁鹊与齐桓公的对话，道出了书的本质：

桓公读书于堂上，轮扁斲轮于堂下，释椎凿而上，问桓公曰：“敢问，公之所读者，何言邪？”公曰：“圣人之言也。”曰：“圣人在乎？”公曰：“已死矣。”曰：“然则君之所读者，古人之糟粕已夫！”桓公曰：“寡人读书，轮人安得议乎！有说则可，无说则死！”轮扁曰：“臣也以臣之事观之。斲轮，徐则甘而不固，疾则苦而不入；不徐不疾，得之于手而应之于心；口不能言，有数存乎其间。臣不能以喻臣之子，臣之子亦不能受之于臣，是以行年七十而老斲轮。古之人与其不可传也死矣。然则君之所读者，古人之糟粕已夫！”

轮扁因为自己不会传授经验，就推论圣人也无法将其修行心得著述传世，走向了事物的极端。但这也说明：书之所载，只不过是作者“视窗”过滤后的信息而已。书可以读，但绝不能盲信。那位小时候被母亲迁来迁去的孟子，就曾振臂发愤地喊出：“尽信书，不如无书！”

据清编修的《明史》记录，张献忠在四川杀人竟达数百万。问题是，当时中国总人口才多少？张死后二十多年，四川人仍然在坚持反满斗争，那些人难道会死而复生？

仅靠读书接受知识，会限制人的信息来源和认知世界的视窗。所以，我国古人倡议“读万卷书，行万里路”，通过行万里路，拓宽自己的视窗。

不同的环境和阅历，决定了不同的认知和思维视窗。视窗不同的人，很难沟通交流。《庄子·秋水篇》对这一问题有深刻的阐述：

井蛙不可以语于海者，拘于虚也；夏虫不可以语于冰者，居于时也；曲士不可以语于道者，束于教也。

拘于虚，居于时，束于教，是三种不同的视窗限制。

如何拓宽我们的视窗？《庄子·逍遥游》所讲“不龟手之药”故事也许能给我们启迪：

宋人有善为不龟手之药者，世世以泝泝为事。客闻之，请买其方百金。聚族而谋曰：“我世世以泝泝为业，不过数金。今一朝而鬻技百金，请与之。”客得之，以说吴王。越有难，吴王使之将。冬，与越人水战，大败越人，裂地而封之。能不龟手一也，或以封，或不免于泝泝，则所用之异也。

掌握“不龟手之药”秘方的宋国家族，“视窗”里只有“泝泝”，世世代代为人漂洗丝絮，每年所得不过数金。而途经的客人，发现“不龟手之药”后，将其“视窗”瞄向了远方的吴越战场，借助于“不龟手之药”，获得了“裂地而封”的巨大收益。

只有那些保持通达变通的思维习惯、能够拓宽自己“视窗”的人们，才有可能发现生活中的“不龟手之药”。也就是所谓“机遇只光顾有准备的人”。



AT5激活太阳，欧耶！ AT5激活太阳，欧耶？

玉渊杂谭

艺术家的自我修养

文·杨雪

李云迪在韩国演奏肖邦第一钢琴协奏曲时“栽”了。墙倒众人推，幸灾乐祸、口诛笔伐者陆续有来，大意是天才钢琴家近些年频繁出现在商演活动中，是否因此疏于练琴云云。懂行的人却明白，钢琴演奏是临场发挥的活儿，失误在所难免，弹错几个音尚可蒙混过关，一旦节奏错乱，不“推倒重来”还真不容易整明白。而临场发挥又受诸多内外因素影响，跟专业修养谈不上必然联系。

实际上，世界知名的音乐大师也难免出现失误。钢琴家波利尼弹舒曼钢琴协奏曲时也曾出现过“断片”；我国著名钢琴家傅聪曾在演奏肖邦作品的一个上行乐段时突然“过不去”，好在机智地从低音再把上行乐段弹一遍而顺利过关；钢琴家波格莱里奇曾在国家大剧院演奏《彼得鲁什卡》时用力过猛，竟将琴弦弹断，换了一架钢琴演奏才得以继续。

显然，李云迪失误事件的持续发酵，不是因为公众对古典音乐乃至高雅艺术具有多么高明的鉴赏力，或者在听觉要求上有什么洁癖，只是因为失误的是李云迪。这是个有趣的现象，如果没有社会需求、市场选择，天才钢琴家不可能凭一己之意志在娱乐圈混得风生水起。换句话说，对于艺术家明星化包装，公众是乐于消费的。而反过来，一旦“天才”马

失前蹄，公众又调转枪头，以伤仲永的姿态来指摘这种过度消费。

此等“集体反思”不仅双重标准，而且逻辑混乱。谁也无法举证，说明参加黄晓明婚礼就必然导致疏于练琴。况且，疏于练琴和演奏失误之间本也不存在必然联系。退一步讲，钢琴家明星化而频繁露脸于人前，潜移默化地拉近了小众艺术和大众娱乐之间的距离，也没有什么不好吧。再说了，艺术家走什么路线，是束之高阁还是接地气，是清苦修行朝着大师级努力还是戴着光环混迹江湖，乃是艺术家的个人选择。

最近看到一篇报道采访葛优，他透露曾拒绝了那么多综艺节目的邀请，称不愿意自己被过度消费。也许性格使然，也许对自己有其他境界的要求，我们喜爱的葛大爷做出了这样的个人选择。对于我而言，我敬重葛大爷的“激流不进”，但也不能因此非议其他名人上综艺节目就一定low。

周星驰电影《喜剧之王》里有个经典道具——《演员的自我修养》一书。用在电影里讽刺了一个穷困潦倒的死跑龙套的小人物，喜剧效果惊人，笑中可带泪。受启发，写下此文标题——当下艺术家们的自我修养问题，确实也形成了一定的喜剧效果。

艺苑



白桦树(油画)

阿廖娜(俄罗斯)

乐享悦读

风烟滚滚 谁主沉浮

——读凌晨新作《太阳火》

文·姚利芬

一口气读罢女作家凌晨刚出尘的小说《太阳火》，下意识地点念出李贺的诗句：“黑云压城城欲摧，甲光向日金鳞开”。此句无疑是《太阳火》的绝佳解语。小说以万余字的篇幅营造了兵临易水、拔剑封喉的科幻场景：由当下宕开50年，春寒料峭的3月，地球开启“冰寒”模式，太空进入超级计算机(以下简称超算)时代——20年来超算帮助人类消灭疾病和战争，走入深海与太空，已渗透进人类生活。

人类此番启动的由超算操作的重大工程“AT5计划”，欲激活太阳，产生太阳风暴，引导太阳风只攻击大气层中的特定位置，触发全球大气对流改变，促进全球气候改变，阻止或减缓地球日渐变冷的趋势。凌晨的科幻构思惯以在幻想与真实的交界线上行走，新作承其衣钵，根植现实又不乏恢宏飞腾的想象，兼有夸父逐日的豪气与拈花轻弹式的对科学乐观主义的反弹。

小说选取了“AT5计划”执行前的6个小时与执行后的1个小时为时间节点，描

绘了以“文昌航天中心综合处的AT5执行部”为核的三个观测点的情况：月球国际天文台、贵州平塘县大窝凼天文台、中学联盟天文台昌平台。行文以时序为经，以观测点为纬，7个小时，4个地点，层层推演，直至操作执行时达至高潮。时间点的浓缩使得叙事节奏紧凑有致，如文中开篇所叙：“大厅墙上，一行数字不断变化，如同战鼓的鼓点，敲打着每个人的脚步。”AT5计划执行日期为3月20日，日期的选择似有寓意，初春时节，万物始苏，蛰虫萌动，似酝酿着无数种可能。

小说的距今拉开不过50年的跨度，赋予了该文“近未来”的特色。地球正在变暖还是变冷是近年争议不断的话题，小说以地球变冷为故事讲述背景，有立足现实的可信感。凌晨宛如游弋于幻想与现实海洋的精灵，恰如张懿红与王卫英在《现实与浪漫相映生辉：凌晨的科幻世界》一文中所提：“凌晨用笔老辣，营造科幻小说现实感的方法与技巧是多样化的，科幻想象与生

活细节、地域风情交融，将科幻内核植入现实生活的土壤；以日记体、书信体、实习报告等第一人叙述视角讲述科幻故事，善制造言之凿凿的真实感。”

《太阳火》故事中设定的地点从北京到贵州，由地球而月球，迤迤而下节点式的叙述方式增强了科幻场景的代入感，像湍急的河流。读者乘舟顺流而下，风急浪回处，不缺的是心跳。记者出身的科幻作家韩松曾有言：“科幻小说讲述故事的最高境界莫过于写得与新闻报道一样真实，使读者产生身临其境的现场感”。《太阳火》即有新闻报道式的鼓点节奏。

凌晨的小说有着对科学精神、英雄气质的敬仰与赞美，又不乏反思与质问。该小说即以“在太阳上动土”的AT5计划为核，然而，夸父豪情在文中被凌晨以四两拨千斤的妙手轻弹。70多年前，阿西莫夫提出了著名的“机器人三定律”，欲保证机器人友善待人，曾有人认为是这些定律是现成的方案，能挽救我们免于被机器

人毁灭的世界末日。那么，阿西莫夫的安保措施成功经历了时间的考验吗？凌晨的思考是：没有。小说拟构了看似滔然受命，实则潜流暗涌的“超算”形象。“超算是超级计算机，也是强智能计算机，从他识上升到我识不过是个时间问题”。27艘“燃火者”，按照设计要求有条不紊一一爆炸，刺激太阳，促使产生了预期中的耀斑爆发。控制大厅中响起一片欢呼声和掌声之时，超算却似一只看不见的黑手暗自对人类实施了反控制，“仿佛被巫婆的扫帚扫中了一样，地日之间的人类设施空间器一个个爆炸，产生一朵朵小火花，翻腾盛开在黑色的宇宙绒布上，有邪恶的美丽。”地日空间凌乱得一塌糊涂，90多个无人和载人的空间站被瞬间直射而来的高能摧毁，人类在“地球—太阳”间的设施均无幸免。

人定胜天的科学乐观主义精神在此被质问，世界的发展似不可预估，重重危象似花苞般立于未来春天的枝头。也许人类恰恰需要的是“举世皆欢你独醒”的意识。“自己造的超算，就要有超算超过自己该怎么办的预期啊”，主人公杨志远在最后拾衣出门，没有“仰天大笑出门去”的豪情，有的对未来的满腔忧虑、落寞与茫然。

刘慈欣谈及科幻小说中人物形象的塑造时指出，人物形象的概念在科幻小说中两个方面的扩展：种族形象和世界观。凌晨的《太阳火》塑造了两类世界的形象：人类世界与已经拥有“我识”的超算文明。人类与超算的控制与反控制在此升级，由此演绎出新的硅基生命文明，未来谁主沉浮并不可期，以人类道义论是非善恶的时代已如昨日黄花。《太阳火》有“夸父”式的英雄悲情，却又是从另一个角度呼唤人性，从某种角度上说或许是历史的进步。随着文明的演进，英雄主义或许会渐渐淡出，终将成为一种陌生的存在。

AT5激活太阳，欧耶！ AT5激活太阳，欧耶？